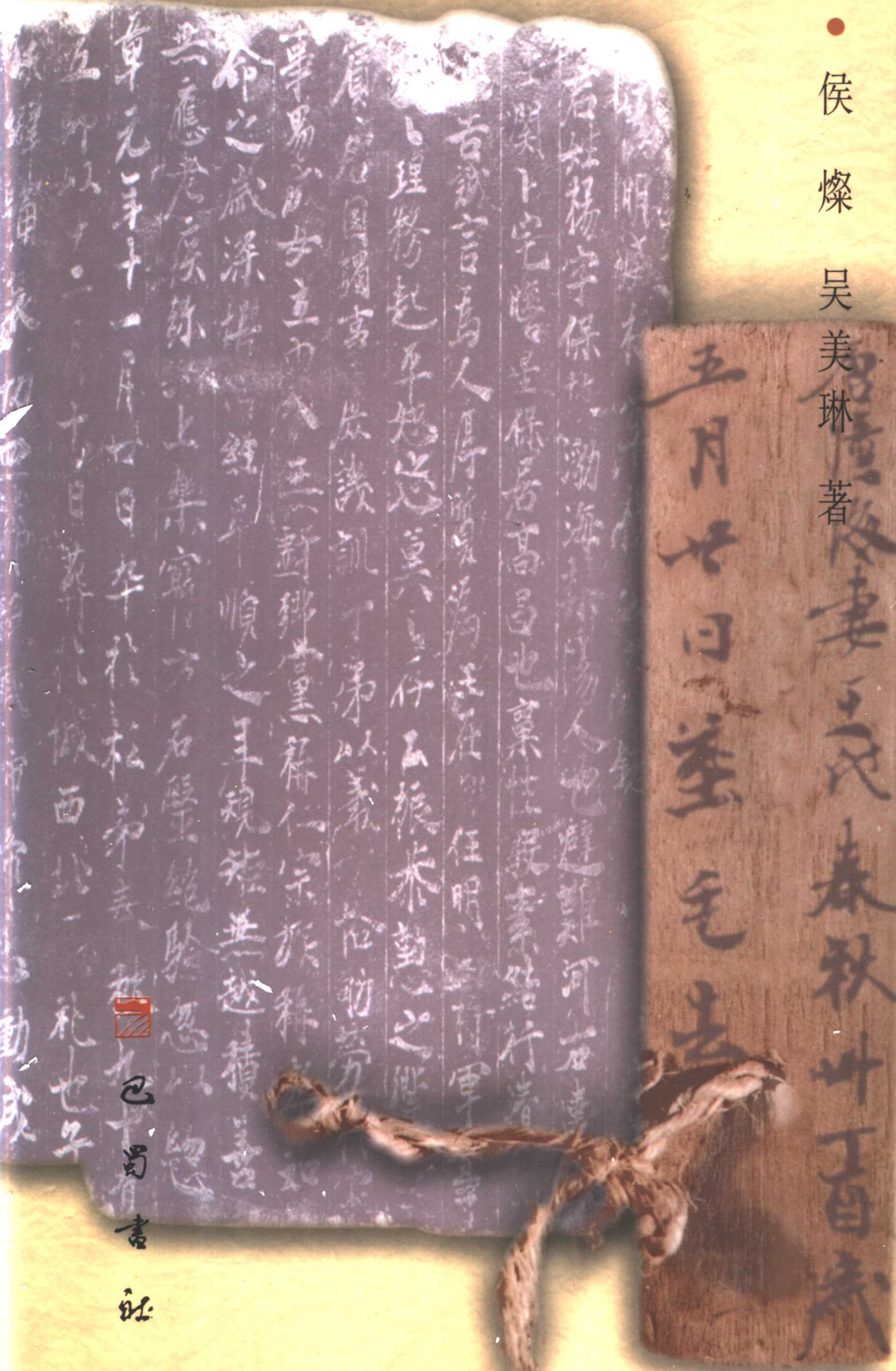


吐魯番出土磚誌集注

上

● 侯 燦 吳美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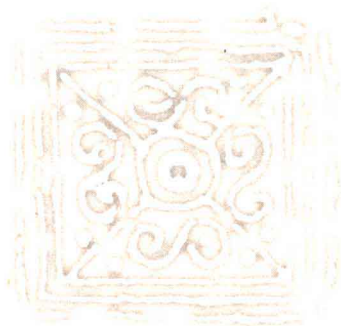


巴蜀書社

吐魯番出土磚誌集注

上

侯 燦 吳美琳 著



巴蜀書社

中國 · 成都

084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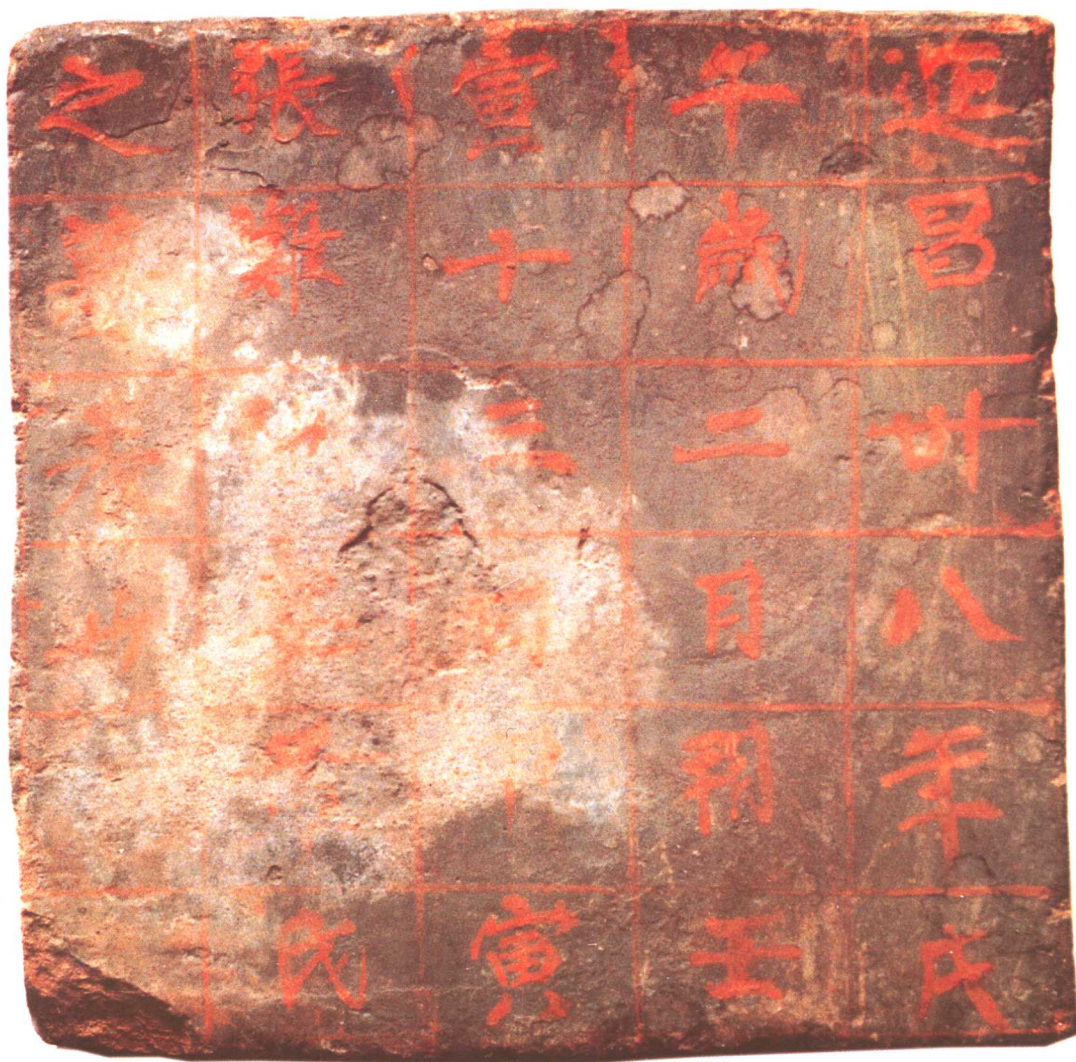
26.3297
414
21



彩圖一 高昌延昌二年(562)張洪及妻焦氏墓表

延昌廿六年丙午
歲十一月朔丁丑
廿日丙午初鎮西
府省事後遂中兵
參軍於交河城選
患殞臣春五十有
五辛氏之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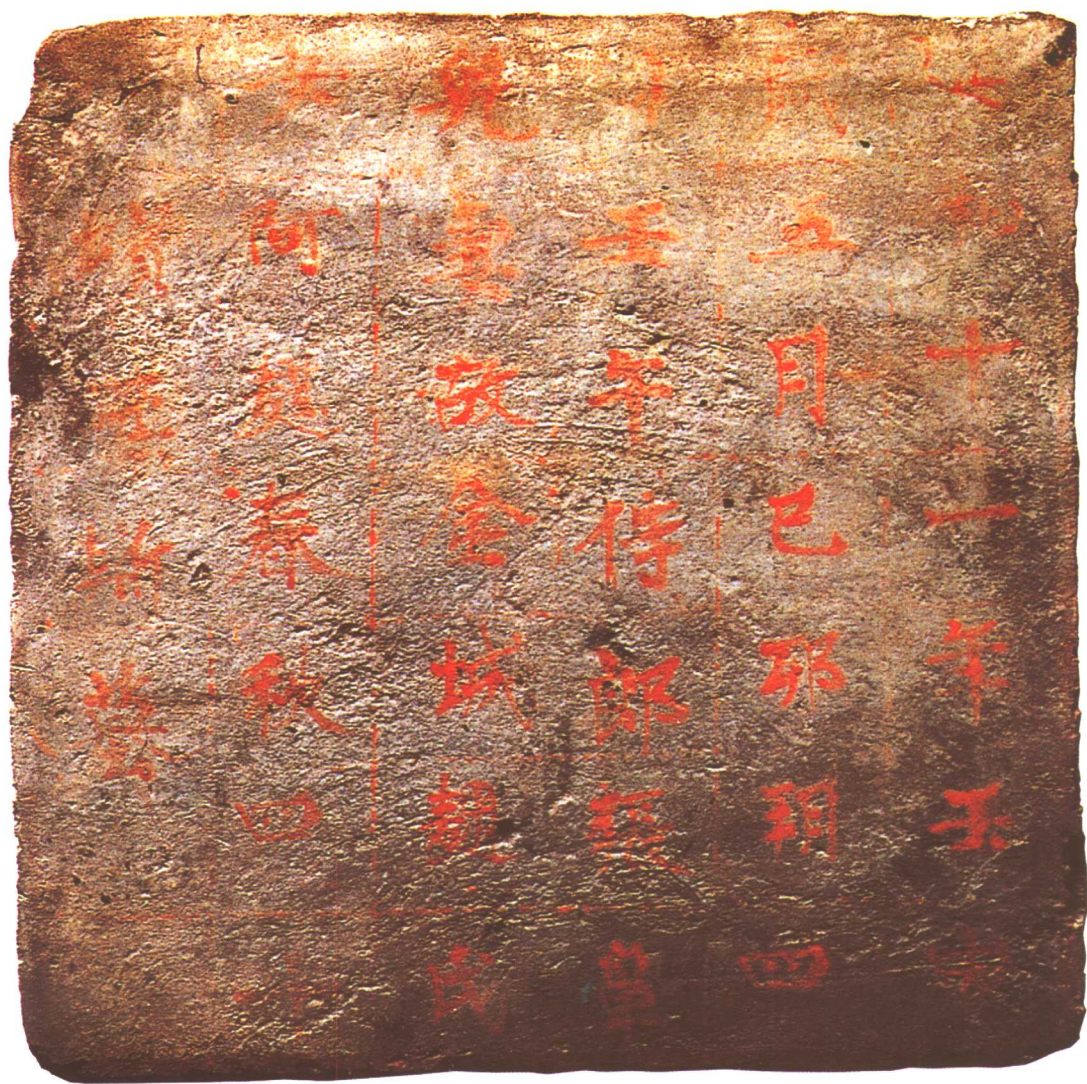
彩圖二 高昌延昌廿六年(586)中兵參軍辛氏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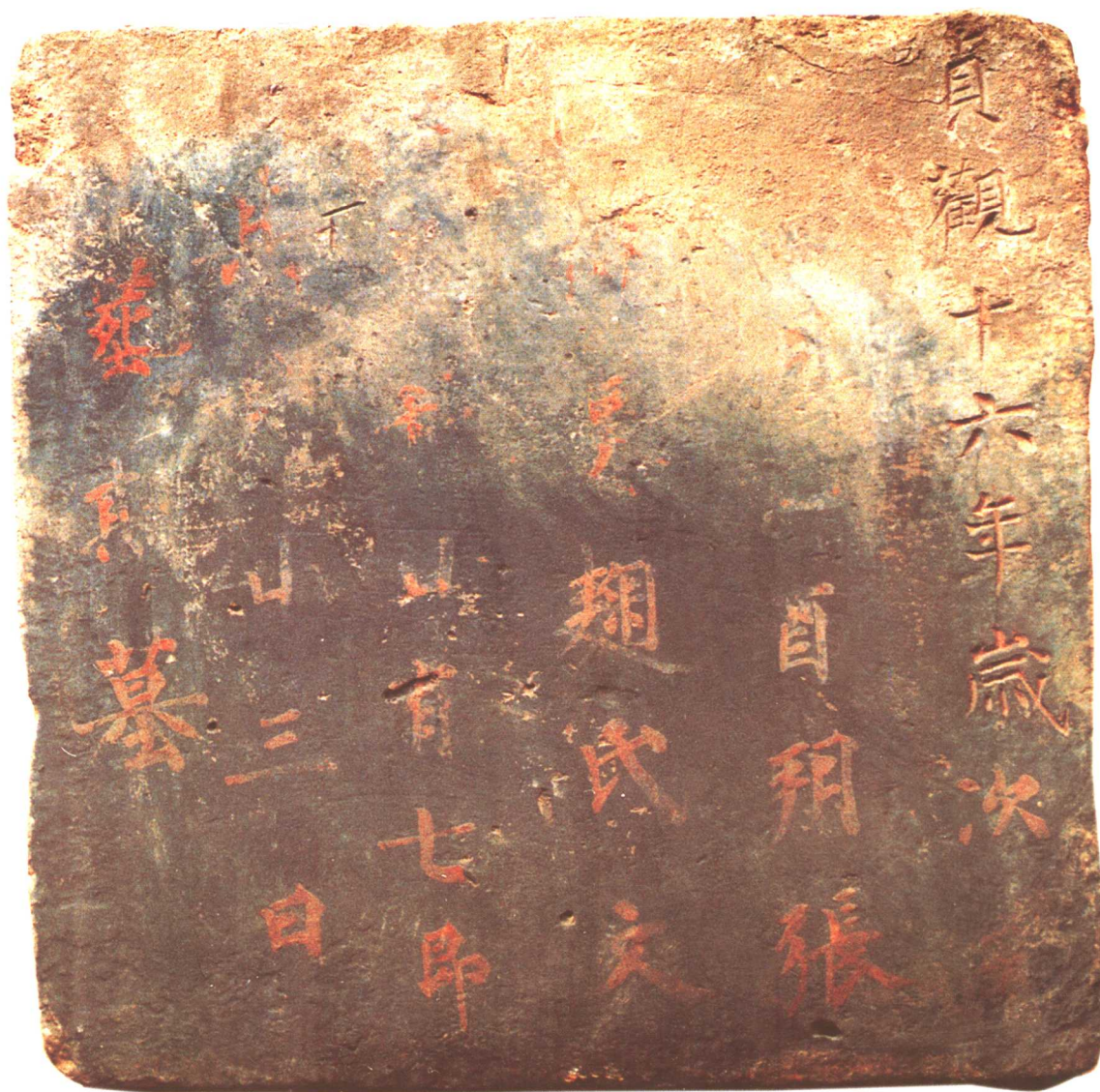
彩圖三 高昌延昌卅八年(598)張難陀妻孟氏墓表



彩圖四 高昌延昌州年(600)傅子友墓表



彩圖五 高昌延和十一年(612)張鼻兒妻鞠氏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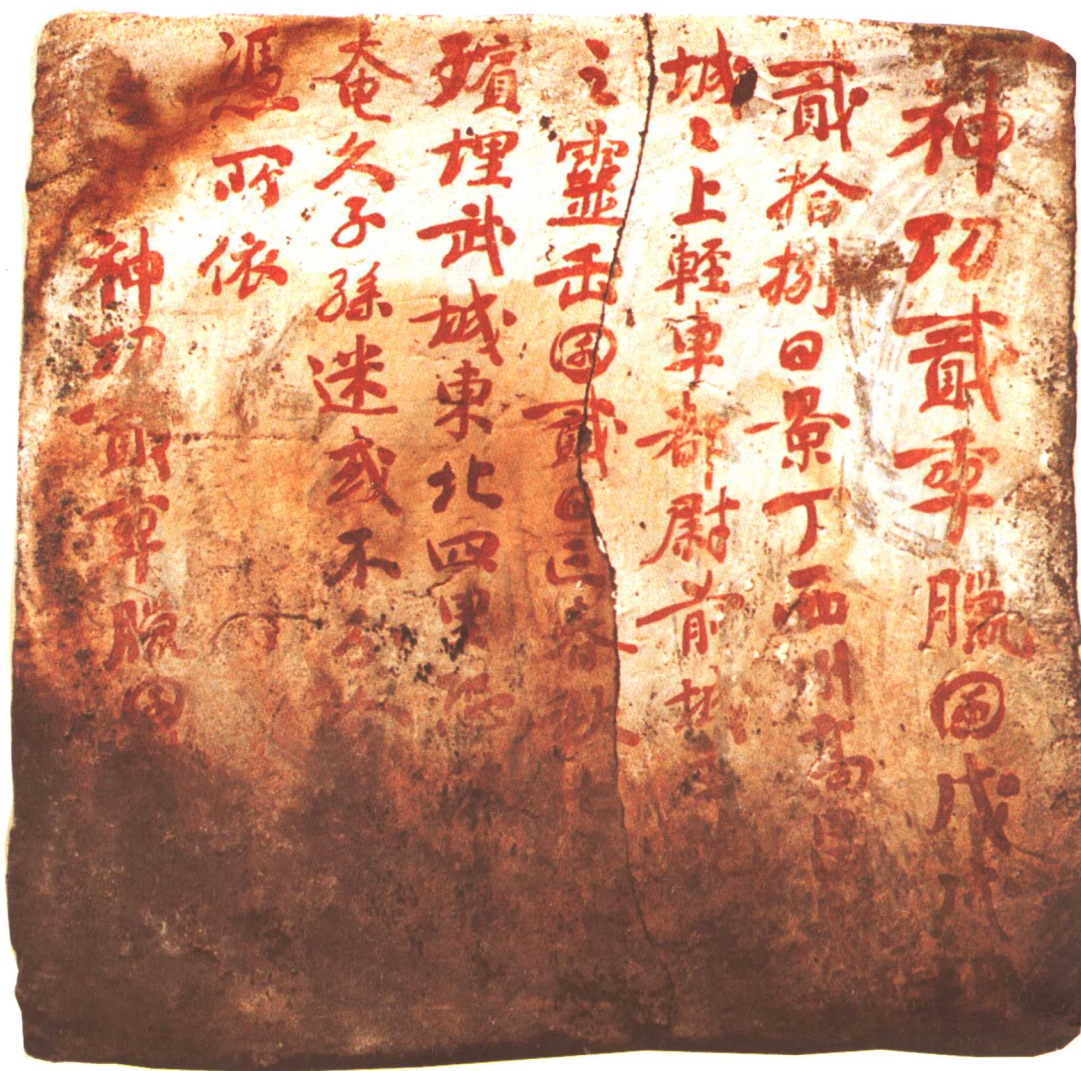


彩圖六 唐貞觀十六年(642)張隆悅妻鞠文姿墓表

維大唐咸亨五年
歲次五月庚戌四日癸丑
西州交河縣人前錄事張歡
唐妻唐氏早棄生知託楚
世為四姓奔逐二舉相推互
無常生於淨國何其竹柏
之相柳而先凋嗚呼哀哉
伏惟尚饗

咸亨五年五月四日

彩圖七 唐咸亨五年(674)張歡妻唐氏墓表



彩圖八 武周神功二年(698)范羔墓誌

前 言

吐魯番磚誌，是指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部吐魯番地區近百年中陸續出土的我國中古史上北朝至唐代的專為記錄死者身世及其有關情況的墓葬文字資料。吐魯番地區古稱高昌，是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國的所在地，因此有些學者把這些磚誌稱為“高昌墓磚”或“高昌墓誌”。本書統稱為吐魯番磚誌。這些磚誌就其質地而言，並不限於磚，也包括石質的、木質的和泥坯。

吐魯番盆地地處中西交通要衝，“絲綢之路”咽喉，是我國兩漢王朝的屯墾重地，歷代封建王朝經營西域的門戶。吐魯番磚誌與享譽國際學壇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具有同等重要的學術價值，是吐魯番學研究的重要方面，“絲綢之路”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這些磚誌不但對判定墓葬年代，研究當時埋葬制度、習俗、官制官職、士族門閥、里籍、婚姻、曆法、文字語言和書法藝術等都是最直接的原始資料，同時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絲綢之路”文化史、中國中古史的重要資料，不但可以補正和豐富史籍記載的缺略，而且也是研究吐魯番出土文書不可或缺的斷代、定代的重要參證資料。

吐魯番磚誌比較集中地出土在兩個地方，一是在今高昌故城城郊西北和東北，即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彼此相連的兩片墓地，另一是在今交河故城溝西雅爾湖（又稱雅爾乃孜溝）古墓區。前者是在大涼政權、麴氏高昌王朝的都城、唐西州的州治所在附近，後者是在麴氏高昌所轄交河郡、唐西州的交河縣治附近。此外，在高昌故城東南約 15 公里，今屬鄯善縣魯克沁鎮和今吐魯番市南約 12 公里的恰特哈勒鄉也出土了少量磚誌。魯克沁鎮曾是麴氏高昌的田地郡、唐西州的柳中縣治，恰特哈勒曾是麴氏王國南平郡、唐西州所轄天山縣南平鄉。這些磚誌有墨迹、有刻文。磚誌的製作方法，一般都經燒製成正方形或長方形，在其磚面上塗抹一層灰色、黑色、藍色或粉白色泥衣，然後在上面朱書、白粉書，更多的是墨書，有的是在刻劃界格後刻字，在刻字中填朱。這些磚誌資料能夠保存下來，主要得利於吐魯番盆地獨特的乾旱氣候和地理環境。

吐魯番磚誌從最早一方在 1910 年出土以來，至 1996 年中日合作發掘雅爾湖古墓為止，據著者統計，20 世紀期間共出土磚誌 328 方，其中被確認為大涼政權的 4 方，麴氏高昌王朝的 206 方，唐西州時期的 118 方。這些磚誌年代上起大涼承平十三年（455），下迄唐建中三年（782），前後長達 320 多年。這些磚誌包括 1912 年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挖獲的 12 方，1915 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挖獲的 18 方（帶去歐洲的 5 方，就地埋藏的 13 方），1930 年中（國）瑞（典）西北科學考查團中方成員黃文弼挖獲的 124 方，共和國成立後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發掘和徵集的約有 169 方（含斯坦因未帶走的 13 方）。此外，散見於各種資料刊布的有 21 方。這些磚誌資料都是著者在長期工作中潛心搜求不斷積累起來的。這次編入本書的有圖版的 270 方，有錄文因各種原因而缺少圖版的有 58 方（其中黃文弼第一次刊布時就省略了圖版 40 方），

這些資料是 20 世紀期間搜集吐魯番出土磚誌最為完備的資料，尤其是有相當一部分圖版係首次刊布，更為珍貴。這些磚誌由於出土延續時間長，刊布極其分散，有的又流失國外，因此將其收集齊備是不容易的；本書著者在搜集過程中竭其所能，有圖版的收圖版，有錄文的收錄文。圖版有不同版本的，選取其中最清晰者收入。古人在製作磚誌時有的塗有泥衣，出土後受到外界環境影響，極易龜裂起甲、脫落殘損；有的在出土前遭到水浸，字迹模糊；有的在發掘時就已斷殘，一旦龜裂模糊、脫落殘壞，磚面文字就無法保留或辨識。因此，收入本書的這些磚誌，有的限於當時拍攝條件，儘管圖版不夠清晰，文字也有缺損，但是在無法取代它們的情況下，這些資料都是古人遺留下來的原始遺物的展現，是十分難得的珍貴資料。

學術研究是天下之公器，是科學家辛勤勞動的結晶，總是在繼往開來中不斷發展。本書磚誌的釋文和注釋，本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充分注意吸收前人和今人研究刊布的重要成果，不主一家之言，不搞門戶之見，凡是能夠給人以啓迪思考的見解，儘量予以采入，對其重要分歧也酌予注出，當然也有著者自己的觀點和意見，力圖客觀展示一個世紀中吐魯番出土磚誌的研究情況和成果。

本書以磚誌主人死葬時間先後編排，不以埋葬墓地為限。大涼政權承平紀年和麴氏高昌王朝紀年，以現代學者研究的最新成果排定。唐代磚誌以例行紀年年代編入。為便於讀者查閱磚誌出土、刊布與研究的基本情況，書中“注釋”部分設有對該方磚誌的“徵引文獻論著題錄”，書後附有“吐魯番出土磚誌檢索表”和“吐魯番出土磚誌文獻論著要目”以供參考。為便於讀者全面了解和研究磚誌的發展情況，書後附錄了與磚誌有關的吐魯番出土隨葬衣物疏，供讀者深入研討參考。

值此新世紀之初，編撰並出版這樣一部集成式、階段性、富有生命力的科研著作，我們認為無論對於學術界還是出版界，都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吐魯番出土磚誌及其研究綜述

吐魯番出土磚誌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與吐魯番出土文書具有同等重要的學術價值。這些磚誌主要出土在今吐魯番市東約 45 公里的高昌故城北郊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區，和市西約 10 公里的交河故城溝西雅爾湖古墓區，墓區聚族而葬，同一塋區按輩分排列，長幼有序。磚誌就出自墓葬的墓道口。這些磚誌，其形制不僅有墓誌、墓誌銘，更多的則是墓表，也包括墓記等物。本書統稱之為“磚誌”。

現將一個世紀中磚誌的出土、著錄及其研究情況和有關問題綜述如下：

一、磚誌出土與著錄情況

吐魯番出土磚誌最早有記載可據的是清朝末年新疆吐魯番廳巡檢張清於 1910 年在高昌故城北郊挖掘古墓出土的唐武周長壽三年（694）張懷寂墓誌銘 1 方，這方墓誌銘為石質，誌文最初著錄於 1911 年由王樹枏編纂的《新疆圖志·金石志》中。繼後，1912 年日本大谷探險隊成員橘瑞超等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挖掘古墓，出土磚誌 12 方。這 12 方磚誌錄文由當時我國旅居日本的學者羅振玉收錄在他集錄的《西陲石刻後錄》一書中。它們是：

1. 高昌延昌四年（564）徐寧周妻張氏墓表；
2. 高昌延昌廿年（580）郭恩子妻解氏墓表；
3. 高昌延昌廿二年（582）賈買苟妻索氏墓表；
4. 高昌延昌廿六年（586）賈買苟墓表；
5. 高昌延昌廿九年（589）郭恩子墓表；
6. 高昌延昌卅二年（592）汜崇慶墓表；
7. 高昌延昌卅八年（598）□伯□墓表；
8. 高昌延昌卅年（600）麴孝嵩妻張氏墓表；
9. 高昌延和九年（610）麴孝嵩墓表；
10. 高昌延壽十一年（634）侯慶伯墓表；
11. 唐龍朔二年（662）張君夫人毛氏墓誌；
12. 唐儀鳳年間（676—678）侯府君夫人張氏墓誌。

在這 12 方磚誌中，1、2、5、8、9、10 六方被刊於 1915 年日本出版的《西域考古圖譜》和 1937 年出版的《新西域記》裏。1943 年日本關東局編纂《旅順博物館圖錄》，除再次收錄 1、2、9、10 四方磚誌外，又刊布了編號 11 的圖版。據 1996 年韓國學者閔丙勳在《國立中央博物館藏^{토르판}出土墓塋管窺》一文，又刊布了編號 3、4、6、7、12 的磚誌圖版，可惜這些圖版字迹十分模糊，有的磚誌已碎成數塊。

1915 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三次來新疆探險，在阿斯塔那挖掘古墓，據他在 1928 年出版的《亞洲腹地》(Innermost Asia) 卷 2 中刊布的描述資料和卷 3 附錄 A、附錄 I 刊布的錄文，有磚誌 17 方。這 17 方是：

1. 高昌延昌十一年(571)王元祉墓表；
2. 高昌延和七年(608)張叔慶妻麴太明墓表；
3. 高昌延壽二年(625)王伯瑜妻唐氏墓表；
4. 高昌延壽五年(628)王伯瑜墓表；
5. 高昌延壽九年(632)張□□墓表；
6. 唐貞觀廿年(646)張延衡妻麴氏墓表；
7. 唐貞觀廿年(646)張延衡墓表；
8. 唐貞觀廿二年(648)王歡岳墓表；
9. 唐永徽三年(652)王歡悅墓表；
10. 唐乾封二年(667)范永隆夫人賈氏墓誌；
11. 唐乾封二年(667)王歡悅夫人麴氏墓誌；
12. 唐乾封二年(667)汜延仕妻董真英墓誌；
13. 唐總章元年(668)王雅墓誌；
14. 唐永隆二年(681)張相歡墓誌；
15. 唐永淳元年(682)殘墓誌；
16. 唐永昌元年(689)汜延仕墓誌；
17. 武周神功二年(698)范羔墓誌。

在這 17 方磚誌中，被他帶走的有 5 方，在《亞洲腹地》卷 4 裏有圖版的有 1、5、8、9、10、11、14、17 八方。未被帶走的有 12 方，其中 2、4、7、8、12、17 六方和 3、6、9、13、15、16 六方於共和國成立後被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 73TAM504 號墓和 72TAM199 號墓發掘出來，在這些磚誌上還有斯坦因編號的筆迹。此外，在 73TAM504 號墓中還出土了唐永徽六年(655)陽士通墓表 1 方，這方墓表雖不見斯坦因的著錄和編號筆迹，但仍屬斯坦因挖掘無疑。因為 73TAM504 號墓的主人是張善哲及其妻麴法臺，他(她)們各自有自己的磚誌得到了證實，所以這方墓表應屬斯坦因挖掘品。實際上斯坦因挖掘的磚誌應是 18 方。

1930 年，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中方學者黃文弼在交河故城雅爾湖古墓區和高昌故城附近發掘了古墓，出土磚誌 124 方，這些磚誌收錄在他 1931 年刊布的《高昌專集》(其中圖版 84 方，錄文 40 方)中。後來他將 124 方修訂為 122 方，集錄在 1951 年出版的《高昌專集》(其中圖版 70 方，錄文 52 方)增訂本中。

共和國成立以前出土磚誌見於著錄的，還有王樹柟編纂的《新疆訪古錄》中所載的高昌延壽十七年(640)某醫人墓表 1 方，以及他兒子從哈密返歸北京帶回的吐魯番出土磚誌兩方，惜這兩方在運輸途中被摔碎，不見錄文。

1938 年，張維刊行的《隴右金石錄》中收錄了前安肅道尹祁連元得之吐魯番盆地出土的高昌延昌廿

六年（586）周賢文妻范氏墓表 1 方。

1946 年 5 月，畫家韓樂然在阿斯塔那挖掘古墓，據聞得磚誌 8 方。後至蘭州進行展覽，經查當時甘肅《民國日報》（1949 年 9 月 12 日）報導，有兩方見於著錄，1 方是唐貞觀廿年（646 年）成伯熹墓誌，另 1 方是高昌延和四年（605）趙宣墓表。後因此人乘飛機失事，磚誌下落不明。

繼韓氏之後，1947 年 9 月，記者李帆群也曾到吐魯番盆地挖掘古墓，據查他於 1947 年 12 月 5 日發表在《新疆日報》上的《高昌古墓發掘經過》一文，李氏所得磚誌有 3 方，其中 1 方是唐垂拱四年（688）賈大夫墓誌，因有錄文，經我們檢對共和國成立後已轉入新疆博物館收藏。其餘兩方因無錄文，無法檢對，也可能轉入了新疆博物館。

共和國成立以後，從 1959 - 1975 年，因農田基本建設需要，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地區進行過 13 次發掘，發掘古墓 428 座，出土磚誌 135 方，其中阿斯塔那 115 方（編號 TAM），在這 115 方中含共和國成立之前斯坦因挖掘未能帶走的 13 方、哈拉和卓出土的 20 方（編號 TKM）。1965 年，新疆首屆考古專業人員訓練班在交河故城雅爾湖古墓區進行考古實習，發掘古墓 23 座，出土磚誌 8 方（編號 TYM，發掘情況見《交河古城寺院及雅爾湖古墓發掘簡報》一文，載《新疆文物》1989 年第 4 期）。1976 年和 1979 年在吐魯番縣五星公社出土磚誌兩方（見《唐天山縣南平鄉令狐氏墓表考釋》一文，載《文物》1984 年第 5 期）。1978 年在鄯善縣魯克沁公社出土磚誌 1 方（編號 SLM）。1984 年在哈拉和卓古墓區又出土墓誌 1 方（見《唐北庭副都護高耀墓發掘簡報》一文，載《新疆社會科學》1985 年第 4 期）。共和國建立以後，從 1950 - 1959 年，由新疆博物館徵集得吐魯番磚誌 10 方（編號 LI，其中含已知的李帆群所掘 1 方）。此外，從吐魯番地區文管所在《高昌墓磚拾遺》（載《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 3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6 年）一文中公布的資料，除高昌章和十三年（543）朱阿墓表（此墓表應定名為“朱阿定妻楊氏墓表”）、延昌四十年（660）傅子友墓表、重光四年（623）傅僧邴墓表和唐永徽五年（654）令狐氏墓誌、麟德元年（664）眠良墓誌、天山縣南平鄉殘磚誌 6 方與上列磚誌數有重複外，其餘 10 方均不包括在上列磚誌數中。這些磚誌主要分藏在新疆博物館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少量藏在吐魯番地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對於這些磚誌除在各期發掘清理簡報中有過重點報導介紹和散見一些研究文章引用外，集中著錄在《解放後新出吐魯番墓誌錄》（載《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 5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和《高昌墓磚拾遺》兩文中。

1989 年 11 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簡稱《拓本匯編》）第 10 冊收錄了高昌磚誌拓片 10 方，第 18 冊收錄了《張懷寂墓誌》（軸 86）拓片 1 方。前者的 10 方名錄如下：

1. 畫承墓表 誌 5375
2. 汜靈岳墓表 誌 5376
3. 田元初墓表 誌 5377
4. 任叔達妻袁氏墓表 誌 5378
5. 麴惇之墓表（應定名為“麴惇墓表”） 誌 340
6. 張氏墓表（應定名為“索演孫妻張氏墓表”） 誌 5379
7. 趙榮宗墓表 誌 5380
8. 麴謙友墓表 誌 5381
9. 麴懷祭妻王氏墓表 誌 5382
10. 任顯文墓表 誌 5383

在這 10 方拓片中，除 2、3、4、6、7、8、9 七方在黃文弼《高昌專集》和《高昌壩集》增訂本中有圖版，編號 10 的“任顯文墓表”有錄文外，值得令人特別注意的是編號 1 的“畫承墓表”和編號 5 的“麴惇墓表”。“畫承墓表”雖不見黃氏著錄，但據筆者分析仍屬黃氏共和國成立前發掘無疑。經筆者檢對《高昌專集》和《高昌壩集》，見到了《畫承和夫人張氏墓表》，將這方墓表的前半部分與《畫承墓表》對照，除有一字相差（前者卒日為“二日”，後者為“三日”）外，書寫內容完全相同，從書寫的筆迹看似出一人手筆。也許黃氏認為“畫承墓表”與“畫承和夫人張氏墓表”內容有重複而略去的。“麴惇墓表”筆者在 1954 年 5 月原西北歷史博物館編印的《新疆文物展覽特刊》的展品目錄中見到有過登記，但多方尋找，未能尋得，此乃第一次刊布。

1991 年 12 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穆舜英、王炳華主編的《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新疆卷》（簡稱《新疆卷》），刊登磚誌圖版 199 方。名為新疆卷，實際上全部是吐魯番地區出土的磚誌。在這些磚誌圖版中有黃文弼 1930 年發掘的 83 方（《高昌專集》刊布圖版 84 方，尚缺“劉□□墓表”1 方），日本大谷探險隊挖獲的 7 方（其中 6 方係《西域考古圖譜》所刊圖版，另 1 方圖版為《旅順博物館圖錄》中刊布的“唐龍朔二年（662）張君夫人毛姿臺墓誌”），英國斯坦因挖掘的 7 方（《亞洲腹地》卷 4 圖版刊載的 8 方，尚缺“延壽九年（632）張□□墓表”1 方），和《拓本匯編》中拓片 4 方（“畫承墓表”、“麴惇墓表”和“任顯文墓表”以及“張懷寂墓誌”），共和國成立後出土已有錄文或圖版刊布的 92 方。此外，初次公布的有 6 方。這 6 方是：

1. 張蕞其夫人杜氏墓表；
2. 張師兒王氏墓表（應定名“張師兒及妻王氏墓表”）；
3. 張謙佑妻嚴氏墓表；
4. 汜武歡墓誌；
5. 張忠宣墓表；
6. 張顯佑妻墓表。

這 6 方磚誌係吐魯番地區文管所 1986 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發掘出土，發掘情況已在《1986 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發掘簡報》一文中刊布（載《考古》1992 年第 2 期），這次發掘共出土磚誌 7 方，《新疆卷》祇收錄 6 方，尚有“高昌延壽七年（630）張謙佑墓表”1 方未收。《新疆卷》編者在其“前言”中云：“本卷主要搜集編纂了本世紀以來在新疆自治區境內發現的一批高昌時代和唐代的漢文墓表、墓誌，除部分因年代久遠，保存不好，磚碑殘損，文字漫漶不辨，無法收入外，其餘均已盡可能予以收錄，以供研究。”從“均已盡可能予以收錄”可見，編者計劃之宏大，但是經過筆者實際檢對，仍有相當差距。出現的這些差距恐怕不能僅僅以“年代久遠，保存不好，磚碑殘損，文字漫漶不辨”來解釋。

1994—1996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合作，對吐魯番交河溝西墓地進行了三次考古調查和發掘，又出土了磚誌 7 方，其中 1 方刊布在《1994 年吐魯番交河故城溝西墓地發掘簡報》中，因該磚誌殘損，祇有不全的錄文；另兩方刊布在《1995 年交河故城溝西墓地發掘簡報》中，1 方有圖片，1 方祇有錄文；此兩份簡報收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1996 年印刷的《新疆考古發現與研究》第一輯內刊中。還有 4 方隨《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溝西墓地麴氏高昌——唐西州時期墓葬 1996 年發掘簡報》（載《考古》1997 年第 9 期）刊發，其中兩方有圖片，另兩方係生土坯刻劃姓名，祇有錄文。這 7 方磚誌除兩方生土坯外，其餘 5 方圖版均刊發在後來出版的《交河溝西 1994—1996 年度考古發掘報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一書中。

1992 年 11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紹良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收入吐魯番出土唐代磚誌 55 方，

其中屬黃文弼挖獲已在《高昌專集》和《高昌磚集》中刊布的 48 方，大谷探險隊橘瑞超挖獲的 3 方，《新疆圖志·金石志》中的“張懷寂墓誌銘” 1 方，和《文物》1973 年第 7 期刊布的“左憧熹墓誌”與 1975 年第 7 期刊布的“張雄夫人麴氏墓誌銘”各 1 方。此外，還收入了此前祇見羅振玉在 1932 年增訂的，《高昌麴氏年表》序文補記中提到而未見刊布的，“唐龍朔二年（662）麴善岳墓表” 1 方，此方墓表據該書編者稱係“周紹良藏拓本”。從該書所收吐魯番出土唐代磚誌已刊布的資料來看，所缺甚多。同時該書祇有錄文，沒有圖版。

1997 年 1 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了王素編的《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簡稱《文獻編年》），以紀年年代逐年編入了大涼政權和麴氏高昌王朝出土的磚誌目錄共 209 方（含《吐魯番出土文書》二、三、五冊中題解提到的 5 方和張師兄及妻王氏的一磚兩表）。除出土唐代的高昌磚誌外，是一份比較完整的目錄資料，但惜未能收入 1994 - 1996 年中日學者合作發掘交河古城溝西墓地 7 方中的高昌磚誌 6 方（另 1 方為唐代的磚誌），漏收了 1956 年雅爾湖古墓發掘的義和四年的 1 方。這 7 方是：

1. 高昌延昌十八年（578）辛荀子墓表；
2. 高昌延昌廿六年（586）張元尊墓表；
3. 高昌延昌廿六年（586）中兵參軍辛氏墓表；
4. 高昌延昌廿九年（589）□□□墓表；
5. 高昌義和四年（617）錄事參軍汜氏墓表；
6. 高昌年間宋仁墓記；
7. 高昌年間首□墓記。

2000 年 12 月出版的《新疆文物》該年第 3、4 期合刊刊載了穆舜英編製的《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墓誌登記表》（簡稱“登記表”）和由她編製的附一表《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區收集墓誌表》（簡稱“附一表”）以及附二表《北京故宮博物院、遼寧旅順博物館、英國倫敦博物院保存的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區出土墓誌表》（簡稱“附二表”）。從該刊本期前言中得知，本期合刊是在國家文物局多次強調要盡快整理、編輯和出版《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發掘報告（1959 - 1975）》，交出“欠賬”，並且責成新疆文物局抓緊抓好的指示下，“在近一時期集中了全部發掘檔案資料及大量分散的出土文物”的基礎上，“在整理中力求完整”的情況下完成的資料登記表，應該說是比較權威的比較完整的。但是經過筆者一一檢對，除“登記表”協調了已出版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第一至第十冊（圖錄本彙集為四大冊）中涉及的 10 座墓葬“題解”說的有出土磚誌和新列出的 4 方土坯墓記外，却令人有些失望。主要的問題是表的製作粗疏和資料短缺。前者以“登記表”為例，此表應是阿斯塔那——哈拉和卓 1959 年至 1975 年的 13 次考古發掘磚誌資料，却又輯入了 1984 年、1986 年吐魯番文管所部分發掘的磚誌；表的序號編排既按發掘年代，又插入地區編號，相互交叉；墓表、墓誌定名不統一，斷代標準不統一，有的斷代與簡報相矛盾（如序號 13，60TAM324:17，穆表定代在唐，而同期刊載的《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發掘簡報》則劃分在“麴氏高昌時期”）；有的磚誌一磚書兩表，分別書寫夫妻二人，按考古發掘器物號編為一號，按夫妻合葬磚誌通例應定為一表，穆則以兩表定名；其他如磚誌姓名定名不確等。在“附一表”中序號 16 的“麴孝妻張氏墓表”，應為“麴孝嵩妻張氏墓表”，此墓表不應屬“收集”，查羅振玉《遼居雜著乙編》“高昌專錄”和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史料（26）”所載，係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挖獲，應歸入“附二表”。在“附二表”中，所書出土地點均以“TAM 采”標示，與事實不合，這些磚誌全是挖掘，而非采集，其中有 1912 年日本橘瑞超挖獲的，有 1915 年英國斯坦因挖獲的，也有 1930 年我國黃文弼挖獲的。在資料短缺方面，據筆者查檢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的 13 次發掘，實有磚